

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

HANYU WENXUE DE
WENBEN XINGTAI

泓峻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

HANYU WENXUE DE
WENBEN XINGTAI

泓峻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泓峻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

ISBN 978-7-01-016423-6

I. ①汉… II. ①泓…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8942 号

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

HANYU WENXUE DE WENBEN XINGTAI

泓 峻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85 千字

ISBN 978-7-01-016423-6 定价:4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回到谁在写作文本的问题上来

——读泓峻《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一书

高建平

读泓峻先生的《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联想到了近年来的一些理论争论，颇有感触。泓峻先生希望我能写几句，故借这块宝地，说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中国的文学批评，经历了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中心的转变。有人喊出：作者死了！后来觉得这个口号还不能引人注目，于是再喊：作品死了！接下来是：文本死了！接下来还有：读者死了！最终，喊一句最彻底的口号：文学死了！在给文学送终以后，做文学理论的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他们早就想好了，要研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据说，当灵魂离开肉体的时候，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可以在天空翱翔。但是，这种自由很少有人去追求，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要背着沉重的肉身在地上走。文学理论的这个沉重的肉身就是文学，当文学死了的时候，文学理论就成了死灵魂。

我们还是要回到文学研究上来。文本研究的兴起，是有着其合理性的。在文本研究兴起以前的年代里，研究者所做的是，主要是研究作家和作品。作家的生平、创作个性，作家的生活年代、环境，这些都可以研究。向这一方向进发，还可进而研究作家的生理心理状态，家族遗传特性，作家童年的遭遇、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当然，还免不了要研究作家所受的教育，所读的

书，所交的朋友，如此等等。这种研究导致的结果是研究与阅读的分离。当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时，阅读经验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甚至被完全否定。研究者不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而是去寻找有关作家的各种材料，谈一个有关作家的故事。

从作家到作品，也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作品的英文是 work。同一个词，有两个意义，作动词用，是在“做”、在“工作”，作名词用，是“做出来的东西”“工作的成果”。在汉语中，“作品”亦即“所作之物”。这种命名，还是暗示，我们要从“物”或“品”回溯到“作”之人。于是，研究者要换一个词，不再是“作品”，而是“文本”成为研究对象。

“文本”一词的提出，提供了另一个指向。文本一词，英文是 text，原来的词根是拉丁文的 textere，即编织的意思。采用“文本”而不用“作品”，是取作为“文字的构成”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文本”研究强调文学的这样一种特点，即文本与文本之间，有着一种相互的联系，即像“编织物”一样的“互文”（intertextuality）。我们在说话时，有对现成说法、句式、表达方式的借用，在写作时，有文体对表达方式的规定，典故的引用，隐喻象征的手法，如此等等。

文学研究不能局限于猜测作者的原意，而应该看到，意义不仅来自作者，而且来自于文本间的相互生成关系之中。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要学生通过学诗来学会说话。他当然不是指学诗能治哑巴，而是指学诗后在“使于四方”时，能够“专对”，随时引用，恰当地说出能代表自己的意思，别人又能听得进的话。在今天街头的健身中心的广告上，印着的是“健康是硬道理”，高考复习班的广告上，印着的是“提分是硬道理”。中国人一看就懂，而学中文的外国人，就有点困难。这两年，各行各业都在谈“新常态”。通过生活中大量的旧词新用、大词小用，机智幽默地实现了意义的交流，形成了一个有表达力的语言的世界。

研究文学，不能回避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放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以及我们对文本的经验。我们与文学的接触，是从文本的阅读开始的。离开了这一基本的出发点，对作者和读者，以及时代、社会、历史、世界的一切研究，都属于离开文学本身的研究。

泓峻先生提出，过去的 30 多年，我们曾经两次错过了对文本的研究。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引进了西方的文本理论，但文学的“文本性”不能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而更多的人将注意力放在文学的“主体性”上。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登陆，但很快，到了20世纪90年代，更多的人关注的是具有开放性的“文化研究”，而非封闭性的结构主义。其实，这与学术研究的排他性，一味追逐热点，而缺乏兼收并蓄的胸襟有关。“主体性”的提出是重要的，“文化研究”热对中国文学学术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文本研究还是不能少。

在今天这个全球与地方的话题被人们反复讨论的时代，文本研究鲜明地凸显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文学总是依附于语言和文字的。语言和文字本身，它们的全部历史，所积累的大量文本，都将成为研究的维度，它们像网一样，与作为当下研究对象的文本交织在一起。抽离这个维度来谈论普世性，是一切高蹈理论的共同特点。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结合汉语文本来研究，汉语的语言文本特点、表意习惯、文体风格，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过去也有过，但主要作为语言研究而存在。将这种研究放在文学的文本性这一总框架里研究，会看到它们的独特意义。谈论文学的中国性，文学的民族特点，还是要落实在汉语文本上。

最后，我还是要回到前面的话题：文本研究曾经被当成与作家作品研究相对立而存在的研究方法。其实，回到这个词的本义，拉丁文的 *textere* 的编织，不能仅作为“织物”，从而仅仅看到织线间的经纬联系。它仍然保留“编织”的动词性含义。查辞典，这个词最初的本意，与“建造”“制作”有关。“文本”概念没有否定作者的作用。研究者不应该将文学作品的意义看成是作者所总结出来的某一句话，而应该看成是作者带着自己的心意和情感所精心编织的全部织物本身。

如果这样的话，我倡导在作家作品研究，文本研究以及读者反应批评之间实现综合。在经历了对作者、作品、文本、读者，以至对文学本身的大宣判、大屠杀以后，我深深地感到，这一切都要复活，要回归常识，作者、作品、文本、读者一个也不能少，文学也会生存下去。

从作者到读者，是一段漫长的路，有理论眼光的人，会看到其中有很多可研究的点，文本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是作者所作，但又有着自己的独立性，在通向读者的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

谢谢泓峻先生写了一本认真扎实的好书。这本书的研究走在正确的路上。路很长，路上的风景很精彩，希望更多的人去走，走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之路来。

2016年3月5日

目 录

回到谁在写作文本的问题上来	1
导 论	1
一、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现状及本书问题的提出	1
二、对本书题目中几个核心概念的界定	5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	10
第一章 汉语文学文本的文体类别	15
第一节 文体问题在汉语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意义	15
第二节 文体渊源与文体创造的依据	21
第三节 文体之用与文体类别	28
第四节 文学形式的发展与形式分类	37
第五节 文各有体与文体互渗	44
第二章 汉语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	52
第一节 汉语文学文本的互文性	52
第二节 汉语文学文本的统一性	56
第三节 汉语文学文本的等级性	63
第四节 汉语文学文本的衍生性	73

第三章 汉语文学文本的言述对象	8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81
第二节 汉语文学文本中的形而上层面	85
第三节 汉语文学文本中主体的情志层面	93
第四节 汉语文学文本中的叙事层面	101
第四章 汉语文学文本的语言学特征及其文学功能	111
第一节 汉语与汉语文学	111
第二节 汉语文学的声音	115
第三节 汉字与汉语文本的意义生成	124
第四节 汉语语法与汉语文学独特的表义方法	131
第五章 汉语文学文本的言外之意	143
第一节 语言的局限性与超越语言的可能性	143
第二节 汉语文学文本背后的“典”与“事”	147
第三节 汉语叙事的寓言性	156
第四节 汉语叙事的春秋笔法	165
第五节 汉语诗性文本的韵外之致	173
第六章 汉语文学文本的修辞论层面	184
第一节 “文”的“含义”与汉语的修辞性表达	184
第二节 汉语文学文本的结构与章法	190
第三节 汉语文学独特的修辞方式	201
第四节 赋、比、兴与汉语诗性文本的内在结构	211
第七章 汉语文本形态生成与发展的文化语境	226
第一节 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整体特征及其外部成因	226
第二节 哲学观念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影响	231
第三节 经学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影响	241
第四节 政治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影响	249

第五节 科举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影响.....	257
参考文献.....	265
后 记.....	271

导 论

一、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现状及本书问题的提出

本书把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属于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的范畴。

“文本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范畴，是法国当代理论家罗兰·巴特最先提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末，罗兰·巴特发表了《文本理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罗兰·巴特从结构主义理论立场出发，认为“文本理论”研究就是要探讨作品自身的形式结构。其后，沃尔夫冈·伊塞尔《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伊格尔顿《文本·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泰特罗《文本人类学》、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等相关研究著述大量涌现。在后来这些学者的研究中，罗兰·巴特所规定的“文本理论”研究范围实际上已经被突破，并围绕“文本”这一概念，衍生出文本性（textual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等一系列概念。特别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学术界，文本性、互文性、超文本性等概念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它一方面表明了文本理论对西方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文本理论在与西方当今新的学术思潮结合过程中，自身的研究对象与学术旨趣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text”最初被汉语学者译为“本文”，后来又统一改称“文本”。西方的文本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逐渐被介绍到国内的。对西方学者而言，文本理论

所研究的文本，并不局限于文学文本。但是，在多数理论家的研究中，文学文本仍然是文本理论最为核心、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文本理论的影响，也就主要发生在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领域。而且，西方的文本理论最初是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思潮传入中国的，其后也主要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而存在，其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更是集中体现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方面。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西方的文本理论完全可以称之为“文学文本理论”。

在西方文本理论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中国的文学界、思想界、学术界集中反思“文革”导致的人的异化，重建与张扬人的主体性之时。因此，科学主义色彩甚浓的西方文本理论，开始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登陆中国之后，作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文本理论才开始引起文学研究者较大的关注。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文化研究”的兴起，许多人又开始把文本研究看成与文化研究的开放性立场相对立的理论方法，文本理论以及相关的文本研究再次受到冷遇。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西方的文本理论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做出调整，并开始与文化研究、性别政治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学研究思潮结合。这使得国内的学术界对西方的文本理论有了新的认识与评价，并促成了文本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兴，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傅修延的《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一书，以历史视野探究中西文本理论的发展及现代新变，具有宏阔气势；刘顺利的《文本研究》一书，分别阐释了文本观念、文本形态、文本类型、文本结构和文本运作，要言不烦；赵志军的《文学文本理论》一书，则以语言意识崛起为契机，论述了诗歌文本与小说的深层次区别，视角新颖；董希文的《文学文本理论研究》一书，则试图以西方文本理论的历史发展为经、以文本解读层次为纬，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探究文本理论的潜在体系。

就西方的文本理论研究而言，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立足“文本”范畴释义，建立自己的文本科学。如里法泰尔(Riffaterre)的《互文性与超文性》(*Intertextuality vs. Hypertextuality*)，格

雷西亚 (Jorge J. E. Gracia) 的《文本性理论: 逻辑与认识论》(*A Theory of Textuality: the Logic and Epistemology*) 和《文本: 本体状态、身份、作者和读者》(*Texts: Ontological Status, Identity, Author, Audience*), 菲利普·科恩 (Philip G. Cohen) 的《文本与文本性》(*Texts and textuality: textual instabilit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尤金·弗兰西斯·卡林 (Eugene Francis Kaelin) 和艾琳·博斯 (Ellen J. Burns) 主编的《文本和文本性的文本》(*Texts on texts and textuality: a phenomenology of literary art*)。该类研究逻辑性、体系性强, 是一种关于文本的元理论。

第二类, 立足某一学派的观点对“文本”问题进行探究。这方面的著作有菲利普·佩迪特 (Philip Pettit) 的《结构主义的概念》(*The Concept of Structuralism*), 罗伯特·司格勒斯 (Robert Scholes) 的《文学文本的结构分析》(*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Literary Texts*), 斯蒂芬·希德 (Stephen, Hinds) 的《幻觉与文本之间》(*Allusion and intertext: Dynamics of appropriation in Roman poetry*), 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的《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等。这些著述主要研究文本结构分析技巧以及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文本理论研究视阈得以扩展。

第三类, 则是对 20 世纪以来各种涉及“文本”问题的理论综述, 如哈瑞 (Josué V. Harari) 主编的《文本的策略》(*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曼弗雷德·弗兰克 (Manfred Frank) 的《主体与文本》(*The subject and the text: essays on literary theory and philosophy*), 埃里森·李 (Alison Lee) 和凯特·坡顿 (Cate Poynton) 主编的《文化与文本》(*Culture and Text: discourse and methodology in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等。该研究内容丰富, 体系驳杂, 侧重于文本理论的应用和阐发。

中国学者在从事文本理论研究时, 有相当一部分人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西方文本理论的介绍、梳理与评价上。应该说, 这一工作是必要的, 为中国的学者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思考文学的本质、深入开展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视角与十分有效的方法。但是, 如果不把文学文本理论当成特指西方 20 世纪形成的某些理论形态的概念, 而是用以指涉所有的关于文学文本构成、文学文本意义生成机制、文学文本意

义阐释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的话，作为在中国从事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的学者，我们就不能完全忽视中国古代学者的相关成果。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文艺理论著作以及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中，属于文学文本理论的内容是极为丰富与多样的。就用文本理论研究成果指导汉语文学研究这一目的而言，中国自身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文学文本理论，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个性，它所提供的关于文本性质与结构的看法，所使用的文本分析与阐释的方法，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概念范畴，对于同处于这一文化语境中的汉语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具有西方理论不可取代的亲性和。从文学文本理论研究对象的完整性而言，正如有学者所说，西方学者在这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研究视野的褊狭，对西方之外的文本学传统懵无所知。中国学者正可以以自己的优势，弥补西方学者的这一缺陷，进而借自己的研究，与西方学者进行有效的对话。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近年来有些学者，如傅修延、刘顺利等，在自己的文本理论研究中，除介绍西方 20 世纪有关文本理论外，对中国古典文论中与文本理论相关的内容也进行了清理。但是，整体上讲，相对于对西方文本理论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中国自身文本理论的研究要薄弱得多。

实际上，在思考中国学者的文学文本理论研究怎样对中国自身问题加以关注，并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时，仅仅强调研究与清理中国古典文论中与文本理论相关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承认，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在研究问题时，有其自身的思维方法与理论视野。这些思维方法与理论视野，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存在很多的盲点与误区。比如，中国古代的多数文论家更习惯于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而其理性的、逻辑的思维能力往往存在很大的欠缺；在观察问题时，他们往往更愿意从不同现象间看出其共通的一面，而不太擅长于做区别的、分析的研究。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道统思想、臣子意识，在有些时候也会影响他们对一些文学问题做出科学的判断。

因此，作为现代学者，一方面我们要对古代文论家的理论成果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与清理，以现代人的眼光与理论高度，发现这些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内在价值；同时，我们也可以以古人所不具备的知识背景、理论视野与思维训练，去直接面对汉语文学的具体文本，从中发现与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

性的东西，形成既不同于西方学者，也不同于中国古代学者的另外一种文学文本理论。

实际上，直面文本这一研究方法，也是西方研究文本理论的学者所采用的最为主要的方法之一。西方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采用的并不完全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思路。许多时候，它们会深入到文本内部，从对具体的文本形态的考察中，得出自己关于文本问题的意见，建构起自己的文本理论。20世纪文本理论的创立者罗兰·巴特的许多文本研究，就建立在对具体文本解读的基础之上。

因此，通过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考察，总结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特征，探讨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应该是中国学者从事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的题中之义。这种研究将成为中国学者建构自己的文本理论，从而与西方学者进行有效对话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本书在进行文学文本研究时，把研究的对象设定为“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对本书题目中几个核心概念的界定

当本书把论题设置为“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之后，发现在这个论题里面，几个基础性的概念，都并非是自明的，而是需要认真讨论，适当限定的。不然的话，本书的论题将无法展开。

首先是“文学”这个概念。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文学”这一概念可以与英文中的“literature”一词对译，意义是比较明确的。从内涵上，可以用“语言艺术”对它进行界定；在外延上，主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不同体裁。^①然而，在古代汉语中，“文学”这一概念却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有着不同的含义。而且，其不同的含义之间，也并不都是以历时的、相互替代的方式存在的，不同时期产生的不同含义在许多时候可以同时存在。这常常会给我们判定一个

^① 其实，英文中的“literature”一词意义也十分复杂，我们把它译为“文学”时，只是取其中的一个义项，即“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作品”。“literature”的这种意义也是在特定的时期产生的。

古代的文本该不该算作文学文本造成一定的困难。

在先秦的典籍中,就曾出现过“文学”这一概念,只是这一概念与现代汉语中所说的“文学”概念相差巨大。比如,当《论语·先进》记载孔子“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段话时,这里的文学,主要指的是学术研究,尤其是关于经典著作的整理与阐释;作为名词,还可以指学术研究所产生的著述。孔子的弟子中,在经典著作的研究与阐释方面,子夏的成就的确是最高,所传的著作也最多。据说《论语》即为子夏与仲弓合撰,《毛诗》亦传自子夏,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诗序》,即为子夏所作。另外,子夏的著作还涉及《仪礼·丧服篇》及《易传》中的有些部分。汉人徐防有“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①之说。因此,子夏所长,是像孔子一样对古代典籍的整理与阐释,而非创作。“文学子夏”由此而来。

到了汉代,《汉书·儒林传》有“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之说。这里所说的“文学之士”,已经不再是擅长学术研究的学者,而是指擅长诗文写作的文人。汉代有像“文学子夏”一样专治经学的学者,这些人被称为“五经博士”。这至少说明汉代已经出现了经学与文学的分野:经学指的是对经典的研究与阐释活动,文学则主要指的是诗文的写作。

因此,相较于孔子所讲的文学,汉代人所讲的文学,是一个与现代汉语语境中所讲的文学比较接近的概念。然而,两者仅仅是比较接近,而不是完全重合。因为在汉代的文章中,除了赋基本上可以算作“纯文学”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实用性、说理性的文章。而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实用性、说理性的文章,一般是不包含在文学之内的。

按照一种被当代学者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叙述,汉语文学从汉代的大赋开始,逐渐有了对自身形式的“自觉”。这个文学觉醒的过程到魏晋时期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其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出现了“文”、“笔”之辨。这时期,与“笔”对立的“文”,指的就不是所有文章,而是在形式上具有审美性的文章,这种“文”的含义,已经十分接近现代汉语中所讲的文学的含义

^① (南朝)范晔:《后汉书·徐防传》。

了。然而，且不说这里对文学史的叙述，是否有把现代人的观念强行叠加到古人的观念之上的嫌疑，即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去对魏晋时期的“文笔之辨”进行理解，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一时期所发生的“文学的觉醒”，并没有被后世的文学史完全继承下来。到了唐宋古文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关于“文”或“文学”的认识，基本上就又回复到了汉代的认识水平之上。而且，在有些时候，文学一词所表示的意思，与《论语》中使用这个词时的意思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文学观念影响到汉语表达之后才趋向结束。

因此，在古代汉语语境中，文学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活动，有时候指研究与解释经典的学术活动，有时候指诗与文章的写作。文学活动所留下的文本，有些是学术研究成果，有时候是以诗、文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和现代汉语中的文学这一概念完全对等的文学概念，在古代汉语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本书在谈论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时所使用的“文学”这一概念，就不可能完全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学概念对等。假若用现代汉语中的文学概念去框定古代的汉语文本，将把许多古人称为文学的内容排除出去。这种以今人的观念对古代的研究对象进行剪裁的做法，对学术研究是极其有害的，很难让人对汉语文学文本的真实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把握。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所使用的文学这一概念，建立在汉代所确立的与经学相区别的文学概念基础之上，同时也参考借鉴了现代汉语语境中文学这一概念的可取之处，既把应用性、说理性的文章放在汉语文学文本研究的范围之内，同时又以诗歌、具有文艺性的散文以及后世发展起来的小说、戏剧的考察为重点。与此同时，本书把在后来被称作儒家“五经”的文本，以及先秦诸子的文本，也包含在所讨论的文学文本的范畴之内。

另外一个需要在本书中进行限定的概念，是“汉语文学”。

本书在多数时候，使用汉语文学这一概念指称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突出研究对象的语言身份，强调研究对象与汉语之间的深刻关联。

在学术界，中国文学、汉语文学这两个概念经常是可以互换的。但如果从字面上细究的话，两个概念之间内涵与外延都存在差别。从外延上讲，虽然它们交集的部分很大，但并不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并不都是汉语文学，它应该包括中国境内用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文学；汉语文学也不